

編者引言

黃俊傑

一、

《高雄歷史與文化論集》(第一集)這部書所收集的是第一屆(1992年)及第二屆(1993年)高雄市文化發展史研討會中，所宣讀的論文。關於高雄市文化發展史研討會的緣起，陳田錨議長在他的〈序〉中，已有詳細的說明，我就不必在這裏加以重覆。我想趁這部書付梓出版的機會，說明本書各篇論文的基本內容，以及這部書的意義。

首先，我想說明高雄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性。近年來，隨著台灣政治的快速民主化，台灣史的研究也蓬勃發展，各種論著之刊印猶如雨後春筍，目不暇給。從一個較為廣泛的立場來看，台灣史研究方面甚廣，它至少牽涉三個歷史視野：(1)從台灣看台灣；(2)從中國大陸看台灣；(3)從世界看台灣。第一個立場可以建立台灣史研究的「台灣主體性」；第二個立場則較能掌握作為「中國社會文化研究的實驗室」的台灣之史的發展特質(參看：陳紹馨，〈中國社會文化研究的實驗室——台灣〉，收入：氏著《台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79，頁1-8)；第三個觀點則可以充分體認台灣作為一個所謂「世界島」，是以一個近代世界東西各國經濟及文化交流

的中心點，而在近代世界史佔一席之地(曹永和前輩對這個觀點頗有發揮，參看：曹永和，〈荷蘭與西班牙佔據時期的台灣〉，收入：氏著《台灣早期歷史研究》，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79，頁25-44)。不論從以上三個觀點中的哪一個觀點來看，高雄市發展史的研究都有相當的學術價值，因為近百年來高雄市的發展，在不同程度之內都牽涉到台灣本身的發展，台灣作為一個漢民族移民社會，以及台灣作為一個「世界島」等三個層次的歷史歷程。通過對高雄歷史與文化的研究，我們可以比較清楚地掌握高雄地區在台灣發展史上的地位，釐清台灣與中國大陸的互動過程，也可以以高雄為中心，思考台灣如何進入世界史等種種問題，所以，高雄史的研究是台灣研究中一個重要的策略點，值得我們全力以赴。

二、

這部書共收集13篇論文，區分為四個部份：(1)總論篇；(2)歷史篇；(3)文學篇；(4)藝術篇。就其主要內容來看，這13篇論文的基本方向有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從歷史角度拓展高雄文化研究的時間深度。《總論篇》及《歷史篇》所收的6篇論文屬於這個範疇。我的〈戰後台灣的社會文化變遷：現象與解釋〉這篇論文，為本書各篇論文提供一個較為寬廣的背景資訊。這篇論文是以最近六年來台灣學界所出版的論著為基礎，回顧這些論著對戰後台灣社會文化變遷現象的分析及其所提出的解釋。根據本文所作的歸納，我們發現：戰後台灣社會變遷的主軸是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發展。在快速工業化的過程中，各種新興社會現象不一而足，其中較受當代學者所重視的有：(1)都市化的趨勢；(2)教育的快速擴張；(3)社會階層

的變動；以及(4)婦女的新發展。這四個社會現象之間因果相逐，互相影響，例如以都市化為主軸來看，舉凡學校數目的擴張、社會上白領階層的興起，以及婦女的躍動，都集中在大都市。而都市化則又是從工業化所導致的結果。

戰後台灣的文化變遷主要是在「傳統性/現代性」之間以及「本土化/國際化」的兩極之間擺盪。從1950年代土地改革時期到1980年代經濟國際化時代的來臨，在這三十多年期間，台灣農民的價值取向歷經了極大的變遷。光復初期的「農本主義」心態與價值觀，在工業化的過程中已逐漸消逝。對農民而言，「土地」的商品化的性格日益顯著。在工業化衝擊之下，知識階層的大學生價值觀中的「未來取向」與「個人取向」也愈來愈為明顯。以上的價值變遷可以反映台灣文化變遷從「傳統性」向「現代性」的移動。除此之外，隨著工業化趨勢也帶來了「世俗化」(secularization)的文化現象。「世俗化」在民間宗教中表現得較為明顯。研究文獻告訴我們：1960年代中期以前，西方宗教已長足的發展，但在此以後，則本土的民間信仰快速成長。從這項轉變也可以反映出「國際化」與「本土化」在文化領域中的拉鋸戰。

戰後台灣的思想變遷，主要表現在「中國」與「西方」的激盪。官方文化政策提倡以官方所解釋的儒家思想為中心的中國文化，民間學者則致力於對儒學傳統提出新的解釋，但另一方面各形各色的西方思潮如存在主義、自由主義則又有力地衝擊台灣的知識界，形成戰後台灣思想史多采多姿的面向。但是，不論是傳統中國思想的再解釋，或是西方思潮的引介，都受到當時台灣特殊的政治經濟情勢的影響，尤其是政治力的滲透與支配。這個現象很具體地顯示出所謂「台灣經驗」的確有其「特殊性」(unique-

ness)。這種特殊性表現在戰後台灣小型工業的極具韌性；表現在民間信仰或祖先崇拜之深受利得取向 (acquisitiveness) 影響；也表現在官方對儒學的新解釋以及西方思潮進入台灣後之受到扭曲與重組。以上這一切現象都共同告訴我們「台灣經驗」的特殊性格。

爲了使我們對戰後的變遷獲得更具有時間深度的瞭解，所以本書《歷史篇》的5篇論文就從清代、日據時代及光復初期等不同的時間段落，分別觀察高雄歷史的發展。戴寶村教授的〈打狗的地理環境與歷史發展〉一文，將高雄平原的發展，從荷屬時期的開發，到日據時代的港埠建設以及港口市鎮的發展，都有深入的分析，並以高雄港爲中心，指出台灣港口市鎮的發展歷經傳統時期、開港通商時期、殖民地時期等不同的時間脈絡，在空間體系上則由擴散而集中，開港通商是醞釀轉變期，日本的殖民統治則是決定性關鍵時期。基隆、高雄的港埠建設與南北縱貫鐵路開通，改變舊有孤立的市場體系和東西向的商品流通導向。舊港口內外因素交相運作下逐漸沒落，新式港口崛起，1906年基隆、打狗兩港的貿易額已占全島的50%以上，1912年增至80%，1920年則高達90%，貿易的獨占反映港口體系集中南北的態勢已形成，相對地兩港市的都市發展在1920年代已奠定基型。

本書第3篇論文係葉振輝教授所撰，討論打狗英國領事館的空間規劃。葉教授鑽研台灣英國領事檔案十餘年，這篇論文根據第一手史料，重建英國領事館的空間配置，貢獻卓著。本書第4及第5兩篇論文，分別由溫振華教授分析日據時代高雄地區的人口流動，吳文星教授探討日據時代高雄地區的領導階層。溫教授所研究的時間範圍是1920年至1931年，他運用日據時代的人口統計與國勢調查資料，分析高雄地區的人口移動，並將高雄與台北

市人口移動的狀況互作比較指出：從淨遷徙率比較，台北市人口移入中心的四周街庄，呈現高遷出率，人口淨移出的比率高出高雄街四周的街庄。這個現象說明台北市的移入人口，以市郊街庄為主，屬於近距離人口流動。至於高雄地區，移入中心的高雄街，其四周街庄沒有高遷徙率的情形，說明各街庄本身仍有吸引庄民的經濟條件，這種經濟條件應與甘蔗種植及其農業發展有關，移入高雄街的人口應屬較長距離的移民。吳文星教授接著在他的論文進一步分析說明：1920年代以前高雄地區台人社會領導階層概係舊社會精英或其子弟，其後，儘管新一代社會精英逐漸取代舊社會精英，惟就其家世觀之，大多是舊家子弟；易言之，舊家的地位十分穩固而深具延續性，並未因高雄市急劇都市化而呈現出活潑的上升流動現象，僅是舊家子弟以專業教育資格轉化為新式工商業、金融業投資者或經營者。這個時期，台灣其他地區的社會領導階層亦具相同的特徵，此乃總督府採籠絡社會中、上階層之政策所致。另一方面，隨著新市區的發展，1920年代以降外來的社會精英陸續加入，始逐漸降低社會領導階層結構的同質性。外來者以來自高雄、屏東、台南縣市等鄰近地區為主，並以醫師、律師為主體，顯示專業精英較易在新住地脫穎而出，至於工商業者，則除了與本地望族結合外，尚未有具勢力者。吳教授接著指出，新一代台人社會精英大多係高教育出身者，雖具備專業知識和訓練，惟因受限於殖民統治體制，故其政、經地位與上一代相似，所異者乃是下一代的經濟發展因應高雄市之發展，似較上一代多元且更其勢力，因而似較上一代更具社會聲望和影響力。

1945年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是台灣近代歷史的一

大轉捩點。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在距離台灣“光復”不到十四個月，台北發生了緝私煙之警員打傷賣煙女販林江邁事件，由於警員緝私而傷人，由一件緝煙傷人案，卻衍發成蔓延全省，死傷慘重的大悲劇。高雄雖位在南部，亦難免於波及，實由於戰後政府的接收日產工作有瑕疵，且經盟軍轟炸，百廢待舉，卻無法在短時間恢復戰前的狀況；再加上駐軍的軍紀不良，與民眾間時有誤會，社會上早已瀰漫著詭異的氣氛。這時又正好糧荒前所未有的嚴重，米價騰貴，影響民生至鉅，而由南洋回來的台籍日本兵及勞工均在待業中，可以說只要有小小的火花，就必然會引爆。許雪姬教授的論文(本書第7篇)，就是探討二二八事件在高雄的情況。許教授指出：二月二十八日開始，事件逐日向南蔓延，高雄在三月三日晚上已出現燒警察局長座車之事，隨後而來的社會動亂，高雄要塞司令(台灣省南部防衛司令)彭孟緝迅速派兵“平亂”三月七日所有的軍事行動結束。高雄這個南部的工業重鎮，事件發生得晚也結束得早，但在這兩天喪命的至少有二百多人，若再加上清鄉戒嚴期間(三月九日~五月十五日)的逮捕處刑，據楊亮功這前後逮捕了二千五百多人，人數之眾是全省第一。事後在彭孟緝的主導下特別組成「高雄市二二八事件嫌疑人犯調查委員會」以公正人士組成來做初步的審核工作，因而獲釋的幾百人之眾，然而到三月三十一日仍被羈押的高雄就有六百三十二人，也是全省之冠。彭特別向警總請准設立審判單位，採軍法嚴判，並量重刑，幸好五月十六日解嚴，被判刑者(包括重刑者)在被送到地方法院審判後，有五分之四獲得減刑，甚至當場無罪開釋。二二八事件及其緩緩發展，對高雄人的政治態度，以及高雄的經濟、社會與文化，都造成了深刻的影響。

三、

這部書的第二個重要方向是：從文學與藝術這兩個角度分析高雄文化的特質。本書的《文學篇》與《藝術篇》共7篇論文，都是這個方向的作品。

廖一瑾教授在第7篇論文中，首先指出：清代高雄詩人包括：1. 來自大陸的遊宦之士。2. 澎湖移居而來的文士。3. 本地舉人、秀才、私塾教席等。以康熙年間的鄭應球、卓夢采；乾隆年間的卓肇昌；嘉慶年間的吳性誠、林樹海；光緒年間的陳日翔、盧德嘉為代表。詩人作品以采風詩最具特色，又可分為：1. 竹枝詞。2. 鳳山八景及境內八景詩。到了乙未割台之後，許多詩人深感於畢生所學已無用處，乃轉而藉文學以求寄託，藉詩以維繫中華文化，並成立詩社以延續民族命脈。從1911年至1942年高雄地區共成立22詩社。其特色為：1. 塾師與弟子之雅集。2. 以切磋詩藝為宗。3. 兩個以上詩社的聯吟。4. 兩地文人的聯誼。5. 合聘名師以指導詩藝。6. 第二代另組詩社。7. 兩社併為一社。8. 以通訊徵詩。9. 創立本省最早的閩秀詩社。而詩壇特色則以私塾為詩社發源地，塾師為詩社的召集人。除本地詩人外，頗多由澎湖移居而來的詩人。擊鉢吟為雅集主題，聯誼與切磋詩藝並重。而且，閩秀詩人文采斐然。

在日據時代高雄地區的閩秀詩人中，黃金川(1907-1990)是一位代表人物。黃金川是高雄陳中和先生的媳婦。在台灣南部發展史上，台南與高雄是以米糖之生產而在台灣經濟上居於舉足輕重之地位。遠在17、18世紀，台南平原就是台灣蔗糖重要的產地。台灣南部產糖區中所謂的「台灣府產區」北起北港南到安平，所謂

「打狗產區」則北起茄定南至恆春(參考：林滿紅，《茶糖樟腦與晚清台灣》，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8，頁29)。高雄陳中和家族的興起，就是以南部地區的米糖生產為其背景的。1887年(清光緒13年)陳中和離開當時所任職的順和棧，自創「和興行」，作為順和棧集團下的店號之一，順和棧集團共同壟斷了打狗、鳳山、阿緱地區米、糖的出口，當時有「新台灣」、「安平」、「打狗」三艘大帆船往來安平、打狗之間轉運米、糖的外銷，陳中和先生逐漸崛起成為南台灣之殷商。1900年，陳中和創立台灣製糖會社，後來再創立新興製糖。1903年3月，陳中和創辦「南興公司」於三塊厝(鹽埕區建國橋東邊)。從高雄的地理位置來看，高雄港是與中國大陸的福建、廣東，以及日本的橫濱等地貿易的重要港口，陳中和的崛起實與高雄優越的地理背景有十分密切的關係。從高雄地區的發展史來看，苓雅寮原來是由漁民定居而形成的聚落，到了18世紀中葉以後逐漸發展成為市鎮。陳氏家族的落籍所在即為苓仔寮的頂寮附近，開台祖陳元(中和之曾祖父)約在一七八〇年代移渡來台定居於打狗灣內苓雅寮，至陳中和時已發展成極富經濟及社會影響力的望族。黃金川在優渥的環境中，從事文學創作。本書第8篇是我的論文，分析黃金川詩作中的現實與情感，我們發現：黃金川的詩作，在相當的程度內展現對中原文化的孺慕之情。黃金川詩學的另一個面向，則是她對農漁民生活的關懷，與她對天災地震中民生的疾苦所表達的同情。這種現實關懷，使黃金川的詩作，能超脫於香奩之外，不沾脂粉氣息，而展現某種寫實主義的取向，在台灣詩史上別具特色。接著，許俊雅教授在第9篇論文中從文學立場，探討黃金川詩作內容，認為黃金川詩作凡三五九首，以七絕之作為多，作品中最引人共鳴者則為「思親」、「寄兄」

、「酬友」、「感懷」諸作，此外，金川女史曾多次參加詩社課題、聯吟，亦頗有擊鉢聯吟之作，唯其情思真摯而感人。其次論《金川詩草》中特殊之現象：夏日詩頗多，佔其詩作一〇・八六％。中國古典文學中，最重要的季節是春秋二季，以春秋為背景之詩遠較冬夏為多，此或與金川處於盛暑的南台灣有關。許教授也探論金川詩歌注重白描之現象，以及用典使事之自然切當並從歷史之脈絡來評價金川詩學之成就。

鍾理和(1915~1960)是高雄地區另一位卓然有成的文學家。施懿琳教授在本書第10篇論文就指出鍾理和作品具有三大思想特質：(1)強調反封建、反權威的「革新精神」，(2)重視不屈撓、不妥協的「人性尊嚴」，(3)表現悲生民、憫萬物的「人道主義」。施教授在這篇論文中，集中探討鍾理和的人道主義精神。施教授主要是從鍾理和的性格具有極強的內省力；加上他所堅持的真實無偽的寫作態度；以及「為人生而藝術，為社會而文學」的創作理念，這三個角度去解釋鍾氏作品特色形成之因。並且從「人道主義關懷人性永恆問題」的這個角度去肯定鍾理和作品的價值。

在高雄地區為數甚多的藝術家之中，我們在這部書中探討劉啓祥、張啓華及洪根深三位畫家的作品。本書第11篇論文係林育淳小姐所撰。林小姐在論文中研究出身台南、留學日本、法國，擁有日據時期最完整的習藝資歷，在戰後卻紮根於高雄，並為推動此地藝術發展盡心盡力的劉啓祥。林小姐這篇論文從藝術史的角度及文化發展的層面，來探究劉啓祥自求學至教學的藝術生涯，及其與社會環境的互動關係。

本書最後兩篇論文都是鄭水萍先生的作品，分別探討張啓華(1910-1987)與洪根深的藝術創作。鄭先生在第13篇論文中指出高雄

地區亞熱帶自然景觀與都會急條發展，均為張氏所開創的白派風格的溫床。這個區域風格以六〇年代～七〇年代特別明顯，不僅呈現在張氏身上，在林天瑞、張金發、陳瑞福、周天龍…等畫家作品中也呈現這種特質。在鄭水萍的筆下，張啓華二十世紀高雄市出生、成長的第一位洋畫家。他的悲喜人生中，一直在進步與保守，畫業與事業之間擺盪。反映出一位開創者在豎立「畫家」典範過程的辛酸，在個體的有限力量下，他發揮了他所有的潛能與活力。從畫家、藝術活動贊助者、推動者、地主、企業家、金融業者、投資者、服務業者…他扮演了多種角色，在百年高雄都會的成長中成為其中一隻有力量的手。

本書最後一篇論文研究高雄都會美術發展史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畫家洪根深，從洪根深成長的時空，與其作品特質、關聯性，及他內在世界…來探索其創作歷程。並試圖解讀、解析其圖象上的意義與高雄都會七〇年代～九〇年代黑派地域風格形成的若干原委。鄭先生認為，洪根深作品扣合了都市發展的節奏、並加以反思，是黑色的幽暗意識視覺性符號的代言人，在官方說法、文字之外，提供了視覺性深切的思想。並由於其活力與高雄其他畫家的創造力與思考，以侯聰慧、文學家楊青矗、戲劇團體南風劇團，共同開展出本區域最獨特的「黑派」區域風格、與楊青矗等人成為高雄黑都的代言人。在世紀末邊陲的高雄都會中，在世界垃圾終結站的高雄都會中，創作出「反都市」、「反文明」的成熟之作，與心象山水的二律背反，交會出洪氏的歷史定位。

四、

在以上的篇幅裏，我簡單介紹這部書共13篇論文的基本論點

，以作為讀者閱讀本書之前的參考。在籌備兩次高雄文化發展史學術研討會以及編輯這部書的過程中，我自己時時依稀聽到來自故鄉高雄的呼喚。我的童年在故居高雄縣大寮鄉渡過，但是小學二年級開始就負笈高雄市。高雄市的都會景色與人文生活，是我青少年時期最熟悉而親切的畫面。現在步入中年以後，故鄉的景象常會在夜深人靜時浮現於腦海中。翠屏夕照，蓮塘倒影，固然是中學時代流連忘返的美景；西子灣落日，愛河夜景，也一樣地使我心馳不已。這部書的籌畫與編輯，可以說是理性的學術研究與感性的故鄉情懷交織而成的。

清代的福建巡撫王凱泰曾在光緒元年(1875年)五月來台灣，在他所賦的〈鳳山南〉雜詠中，有一首描寫當時的高雄的詩作：

綠陰深處偶停驂，水利猶聞故老談，
無數稻花香滿岸，好風吹過鳳山南。

今日高雄隨著工商業的高度發展，大樓林立，「無數稻花香滿岸」的景色當然已杳不可尋了，但是，我們深深相信，在文化的領域裏，經由我們的努力，必定可以開創另一個「好風吹過鳳山南」的文化綠洲。